

卡尔·奥托·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研究

张今杰, 林 艳

(湘潭大学哲学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阿佩尔认为, 20 世纪初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并未使哲学重现繁荣, 为使哲学走出困境, 惟有改变传统哲学中的“唯我论”倾向。为此就必须倡导语言语用学并赋予它以先验特性。他所建构的先验语用学将促进“语言学转向”的彻底完成, 并使之成为第一哲学的第三范式。

关键词: 先验哲学; 语用学; 句法 - 语义学; 第一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5) 03 - 0053 - 05

德国当代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一生致力于改造传统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先验哲学, 为当代西方哲学寻求一条与后现代主义不同的进路。在改造康德的知识论的过程中, 阿佩尔通过对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强调而克服传统哲学中的方法论唯我论, 把语用学与语义学和句法学结合起来从而真正实现语言学转向之后, 先验语用学已彰显为第一哲学的第三范式。同时他也认为, 其实在他之前, 已经在语言分析哲学内部和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以及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那里都有了语用学转向的趋向。

一 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理论渊源

1.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阿佩尔认为:“分析哲学的第三阶段(被其倡导者视为是哲学中真正的革命)受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决定性影响, ……分析哲学已抛弃普遍语言的思想, 转向意义意向的解释学, 即转向传统人文科学的问题。”^[1]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其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观点作了彻底的清算, 提出了大异其趣的“语言游戏说”和“生活形式”理论。阿佩尔说:“事实上, 诸如‘意义’、‘信仰’和‘理解’之类的意义理解问题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占有支配地位。”^[2]而这意味着被语言分析哲学排除的主体又被维特根斯坦所强调。在维特根斯坦的近期著作中, 他把语言的逻辑形式转换为可能的语言游戏的无限多样性的基础的规则, 把

传统先验哲学的主体 - 客体关系具体化为语言用法、生活形式和情境世界解释的功能统一体了。

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中, 无数不同的但有着“家族相似”的历史地发展和解体着的“语言游戏”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或先验语义学的“图像论”。“语言游戏”概念“它在以下方面标志着世界的界限: 它们是语言用法、生活形式和理解着这个世界的某种形式的具体统一体, 每一个都不同, 但仍与其他的相联系。”^[3]这些语言游戏构成语言用法、生活形式和世界(情境)解释的统一体。《逻辑哲学论》中被归结为语言或可用语言描述的世界之“逻辑形式”的所有涵项在《哲学研究》中则被转换为各个语言游戏的“规则”, 规则构成语言的所谓“深层语言”, 包含着有无意义的标准, 同时规定了属于各个语言游戏的情境世界的先天本体论结构。这种“语用化”的结果是: 与关于科学语言精确性的绝对理想一起, 自然科学的世界理解的垄断地位被抛弃了, 让位于世界理解的内在于各个语言游戏的标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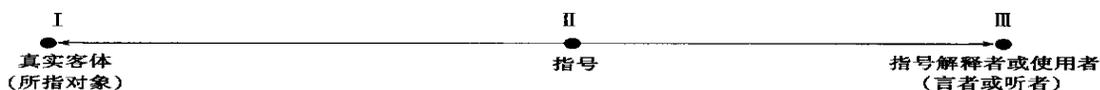
维特根斯坦认为, 在语言游戏中, “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对此阿佩尔是这样来理解的:“独自一个人——即与社会隔离的人——不能遵守一个规则, 换言之, 一种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 ……在社会情境之外, 只基于逻辑, 我们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遵循了一个规则, 即不能判定他的行为是否‘有意义’。”^[4]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不可能存在仅属于私人的语言规则, 或者反过来说, 任何规则都不可能被私自

【收稿日期】 2004 - 11 - 11

【基金项目】 湘潭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04sqd15)

【作者简介】 张今杰(1972 -), 男, 湖南宁乡人, 哲学博士, 湘潭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科技哲学;
林 艳(1980 -), 女, 湖南宁乡人, 哲学硕士, 湘潭大学哲学学院教师。

遵守。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以为[自己]在遵从规则并不是遵从规则。因此不可能‘私自’遵从规则;否则以为自己在遵从规则就同遵从规则成为一回事了。”^[5]也就是说,规则如果脱离了公共可测度的准则,就等于是没有规则。简言之,只有以一种语言游戏的存在为前提,也即以一种出自“习惯”或社会“制度”的存在为前提,才有理解和可理解的行为。“语言游戏”把我们带回了“生活形式”的坚实地面。对私人语言或私人遵守规则的批驳实际上是对传统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中的方法论唯我论的一种改造。因此“我把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反对私人遵守规则或‘私人语言’的可能性的杰出论辩视为对我自己的朝向克服现代自笛卡尔到胡塞尔的意识哲学范式的方法论唯我论的主要支持。”^[6]阿佩尔认为,对语言游戏的共同参与这一前提显然取代了那种对他人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指号学的最基本的论断是:科学认识是一种不能被还原为二元关系的三元关系。这里的二元关系既是古典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也指逻辑实证主义在语义学意义上的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二元关系。也就是说,人类的认知不能被还原为纯粹感觉材料的无关系的给予性,也不能被还原为一种二元的主-客体关系或语言分析哲学所津津乐道的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皮尔士实际上推出了一种三位一体的全新的认识论元模式,这三位一体即符号、符号的对象以及符号的解释的三位一体。对于阿佩尔来说,皮尔士的这种三位一体的全新的认识论元模式的推出,意义无疑深远而又深刻,它堪称人类哲学历史上的又一场“哥白尼式的变革”。首先,它坚持“一切认知都是以符号为中介”,人类不可能与世界直接照面而惟有借助于符号认知世界,坚持这种认识论的三个范畴都以符号为依托并都由符号加以整合,这就意味着人类的认识论必须由康德式的所谓的先验意识学说最终转向一种所谓的“先验符号学”。其次,在阿佩尔看来,这场“哥白尼式的变革”更重要的意义还表现为,由于这种认识论的符号学转向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从直接之于客体的感知转向间接的有关主体的语言表达,而主体的语言的表达之为表达,其本身之能否成立不仅涉及一种对其知识论上的语义性的认可,而且还涉及对其社会学上的语用性的评价,换言之,皮尔士对康德哲学的符号学改造也倡导了一种语用学转向。

在阿佩尔看来,皮尔士对康德先验逻辑的改造工作的极点乃是,“探究逻辑的无限共同体”这一“终极观点”,皮尔士指出,这个共同体没有任何确定的限制而且能够确定地增长知识。它既是无限的实验共同体,也是无限解释共同体。阿佩尔认为先验语用学或先验符号学指的是“皮尔士改造康德‘先验逻辑’的一种纲领,也就是以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代替康德的知识的先验主体”^[8]这个作为准先验主体的无限

的移情而达到理解的方法论唯我论。

维特根斯坦以语言游戏理论取代其前期图像论,从前期的“逻辑语言批判”转向“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理论,实际上已经奏响了强调“主体间性维度”的号角,开启了语言哲学的“语用学”维度。

2.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指号学

在阿佩尔的哲学生涯中,皮尔士是影响其哲学进路的一个关键人物。他认为,“指号及以指号为中介的知识的语用学维度的发现,可以追溯到皮尔士的指号、范畴学说和关系逻辑。”^[7]皮尔士关于探究的符号逻辑的符号学的最基本主题即指号联系的三元性或关于真理的指号中介化知识的三元性。它以下图表示:

解释共同体取代了康德哲学中的先验主体意识的地位。这样一个无限的科学家共同体既不能被还原为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不能等同于康德和胡塞尔的先验哲学中所说的“先验意识”或“纯粹意识本身”。它是整合经验材料的有效性的条件。因此阿佩尔认为,“实用主义指号学为我的先验主义的理想提供了一个更广的视域,这个方案深深植根于康德传统而不能很快与彻底的反先验主义者(如罗蒂)一致,它出现于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转向的最后。”^[9]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指号学成为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3. 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在奥斯汀、塞尔看来,语言交往的基本单位不是语句或词语,“言语行为是语言交往的最基本、最小的单位”^[10]奥斯汀认为,一个句法和语义都很确定的话语,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如果我们想要弄清其意图,还必须诉诸说话者(包括听者)所处的特定的情境条件。“语言学由文字的语法结构分析向言语行为分析的转换,标示了语用学的兴起。”^[11]对言语行为而言,可理解的必要条件不仅是言语的语法规则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说话者所处的特定的语境。奥斯汀区分了言语行为的行为式和表达式。表达式即陈述,它有真假性。被语言分析哲学所划归为无意义范围的形而上学命题,如果限定其条件,仍能在谈话中被接受,而有一些貌似有意义的陈述,却不一定是真正的陈述。行为式语句则无所谓真假:我们说出这类话语即完成某个行为,要理解之,不能光靠分析话语中的语法本身,而要把它们放到各自所处的特定的语境中去,离开特定情境条件的制约,行为式话语就很难为人所理解和接受而成为“不得当”的话语。

奥斯汀后来认为言语行为的二分法(即表达式和行为式)虽简易明快,但表达式与行为式二者之间仍有相关性,因此他寻求重构更具普遍性的分类法。他把言语行为分为三

个不同层次的目的,即语谓行为(Locutionary acts)、语用行为(Illocutionary acts)、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三者统一于“语用行为”。“语用行为”中必定包含“语用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语用力量”所揭示的是潜在于说话者的话语中的某种作用或效应,它能使所谈论的话语在接受者那里产生一种特定的领会、注意和响应,接受者只能从特定的情境中获得信息,才能理解说话者的意图,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语用力量概念表明一个语用行为取得成功的程度取决于接受者的理解和完成说话者期待于他的作用程度。

塞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可表达性原则”,即凡是被意味的东西,均能表达出来。在实践中,我们总会面临“辞不达意”的窘境。为此,我们必须把话语理解为一个整体,并从整体上来构成和理解话语的意义,这一整体包括句法-语义结构和话语的情境语境及精确的用法规则。

塞尔在其后期的研究中指出,我们在表达事物状态的同时,对于与该表达方式相关的言事行为的基础只能从人的精神的存在方式中去寻找。语用学话语不仅仅是一种言语行为,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说话者的心声,这种心声构成了话语的意义,在意向状态中,我们在说话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意向转移到本身并无意义可言的声音和符号中去了,正是意向性这种精神状态的特征,使得语用行为成为可能。意向性和行为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的解释结构。

言语行为论强调语句意义对言语行为情境的依赖性,实际上也就是对语用学的一种强调。奥斯汀、塞尔对言语行为的情境和用法规则以及意向性的强调和重视,成为阿佩尔先验语用学对主体间性张扬的重要理论源头。

二 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理论内涵

阿佩尔先验语用学作为通过对康德先验逻辑进行改造而建立的一种理论形态,无疑一方面不会彻底背离康德哲学,另一方面必须考虑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因而先验语用学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紧跟哲学发展的新动向,在语言哲学中,把对句法-语义学维度的关注转换为对包括语用学维度在内所有三个维度的重视;其次是强调语用学本身所具有的先验特性,以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

1. 从句法-语义学维度到指号学三个维度的完整统一

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维度的区分可溯源到皮尔士指号结构理论,他区分了指号过程的三个要素,即指号本身、为指号所指的对象、指号的接受者或解释者。后来莫里斯把指号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元关系作为指号学的基础。他在语言哲学的分析和科学哲学中区分了指号学的三个方面或者说对指号进行考虑的三个角度:句法学(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语用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不是什么秘密。”^[12]阿佩尔认为皮尔士的三元指号过程的所有三个维度相结合才是语言学转向彻底实现的途径。而三元指号过程三个维度的结合又主要体现在理解意义的三个角度即外延、

内涵和意向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上。

阿佩尔认为,要克服先验语用学“抽象谬误”,必须把语用学和(先验)语用学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一个关于真实所指对象的问题。抽象语义系统可能包含一些根本不能证实的所指,例如圣诞老人、飞马之类的东西,因此证明一个符号的所指不仅是语义学问题,而且是语用学的问题,必须由一个符号解释者的主体间性交往来保证。阿佩尔通过揭示关于所指的意义的理解的三个概念即外延、内涵和意向性来说明语义学维度和语用学维度的有机结合。阿佩尔认为意义理解的这三个方面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折射出语义学和语用学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在术语的内涵和主体的意向性关系上,阿佩尔认为,“没有可能区分所指示东西的意向的概念——即终将认识作为某物的某物——与作为名称内涵的公共意义的概念。”^[13]也即是说,在公共意义的内涵和主观的意义意向之间的方法论的抽象区别,必须被悬搁起来。阿佩尔论证说,我们“不可能把指示性的意向性概念(从某物之为某物的概念性确认来说)从作为普遍的或正当的名称的意向性的公共意义的概念中分离出来。”^[14]也就是说认知的主体的意向意义与语言指号的公共意向意义(即该词语的内涵)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阿佩尔认为,意向主体必须通过符号解释或把自己的意义意向贡献给语言的公共可分享的意义从而享有公共意义。总而言之,“我们之前所断言的用语用学对抽象语义学的结合,暗含了在公共意义意向与个人主观意义意向之间的抽象区别被悬置。”^[15]每个意义意向主体必须有可能把自己的意义意向贡献给公共的意义意向,否则我们不能理解人类经验构成语言指号的公共意义意向的内容的形成是如何可能的。阿佩尔指出,与方法论唯我论相对立,甚至对他或她的自我理解的意向性的孤立的主体也必须预设公共的意义意向。意向主体最多能断言通过指号解释而分享公共意义意向或能够把自己意义意向贡献给语言的公共分享的意义。“因此在我看来,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是意义意向和主体有效知识的明确的先验主体。”^[16]主观意义意向性与公共意义内涵之间结合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结合的前提之一。

在内涵和外延的关系上,阿佩尔认为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教条乃是认为一个名称的理想内涵决定其可能外延,且独立于人类的实际意向。“这个原则在我看来作为逻辑学家反对心理学家论点的论辩是正确的。在此意义上,人们应该倾向于认为意义即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不在头脑中’。”^[17]但对普特南而言,术语的外延不同于内涵和意向,内涵和意向被认为是精神状态,是头脑中的某种东西。因此外延对内涵和意向而言具有优先性,因为后两者仅仅表达了知识的主观状态,而外延则真正表征了事物的本质。阿佩尔认为内涵、意向和外延之间最终有一些内在的联系,没有任何内涵支持的外延是不可能的,定义从它的内涵中分离出来也是不可能的。普特南的缺点在于他忽略了名称的内涵和主体意向性的作用,如果只借助于指示性的词语而没有内涵确定性介入

的话,就不可能确定一个个体或自然事物。“为了克服我们前面所说的卡尔纳普意义上的逻辑语义学的抽象谬误,在内涵和外延之间的语用学区分需要一种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实用主义完成。”^[18]语用学转向的必要性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在指称中意义确定需要意向性、内涵和外延二者的结合。

在术语的外延和意向性概念的关系上,阿佩尔认为,我们符号理解的意向性不只是可能而且事实上必须与作为外延的意义的确定一致,因为正是通过符号定义的意向内容我们才能打开一个超越了术语的实际内涵的外延意义的维度。这是和塞尔与普特南的观点不同的。塞尔“以意向性取代内涵和外延”,而普特南则“以外延的指示性定义取代内涵”。^[19]阿佩尔认为二者都是偏激的。在他看来,一个符号定义的意向性内容必须准确地与符号定义的术语外延一致,否则它就无法满足其经验条件。

可见,为了避免先验语用学抽象谬误,必须把意义理解的内涵、外延和意向性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注意符号发出者和接受者的意向性作用。概言之,必须以符号解释的语用学维度来补充句法-语义学维度。

因此阿佩尔断言在术语的内涵和可能外延之间有一种内部联系,“这仅表明在内涵和外延的语用学区分需要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语用学完成,以便克服在卡尔纳普意义上的逻辑语义学的抽象谬误。”^[20]第一哲学的先验功能不能由语言学转向的纯语义学观点来履行。“我想指出的是,它可能在先验符号学框架内由语言学转向的先验语用学完成来履行。”^[21]因此要克服逻辑语义学的“抽象谬误”,我们在识别符号的真实所指对象时必须将内涵、外延和意向性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内涵与主体的意向性密不可分,而内涵和外延的关联又使得外延和意向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必须在符号指称的语义维度中加入语用学维度,考虑到符号使用者的意向性作用。

阿佩尔认为,对语用学研究的注重已是不争的事实。要实现康德先验哲学的有效改造,使当代哲学走出困境,就必须把语用学与句法——语义学结合起来,以语用学转向来彻底完成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使之成为第一哲学的第三范式。

2. 语用学的先验特性

阿佩尔认为,在莫里斯的整个指号学体系中,语用学并没有像句法学和语义学那样拥有准先验的地位。他认为“莫里斯的指号学行为主义把指号的意义还原为实际上是以指号本身为中介的可描述的行为倾向,从而也把语用指号解释的主体还原为经验社会科学的客体了。”^[22]或者说,在莫里斯的指号学中,语用学并没有融入语形学和语义学的系统之中,而仅仅是作为经验科学的可能对象。他说:“但甚至莫里斯的语用学即其‘指号中介化行为’的论述也不能表明确认一个适当名称的指示物,因为它最多只能描述行为的一个外在的因果链。”^[23]他认为,如果不赋予语用学以准先验性的功能,那么“当前的指号学研究就不能表明,三元的指号关系是构成主体间有效知识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因而语言学转向就没有完成。”^[24]阿佩尔强调指号主体或使用者的作用,这

些指号解释的主体构成了一个交往共同体,从而为语用学的先验性提供一个必要的前提与基础。布伯纳说:“阿佩尔将先验性的希望寄托在语用学方面,也就是在语用学和先验性之间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相关性。”^[25]阿佩尔的先验性已经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纯粹意识的先验性了,而是关于语言交往共同体的能够保障知识有效性的一种经验的先验性。

(1) 语言的先天性

在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中,语言不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或载体,而是人类有效性知识得以成立的条件。“从认知人类学的观点看,语言指号不再属于知识的对象,也不属于感官,同样也不属于在语言指号对外部自然的干预作用中起中介作用的技术工具。因为作为一切意向意义的可能性条件,指号也已经是知识客体得以构造自身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作为指号媒介的语言也不能被还原为知识的逻辑上的意识条件,这些意识条件被康德描述为‘先验意识’。”^[26]阿佩尔认为,语言作为联结主体与世界的中介具有先天地位,在社会化过程中人们习得的每一个词语不仅仅是个别交往成员的工具,也即个别交往成员借以获得其话语目标的工具,勿宁说它始终是社会互动的制度化规范的体现。语言具有无可非议的先天性。这种语言的先天性也就是以指号或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有效思想的先验语用学的先天性,它的特征是,一方面与构成意义先天性的先于反思的生活实践相关;另一方面,与形成有效性反思的先验自我意识的反思性相关,即与自我意识的先天性和生活实践的先天性都有关联。语言的先验性是知识可能的先决条件。首先,语言是解释世界的可能性条件。阿佩尔认为作为我们认知真实对象的中介的指号功能和理论的指称对象得以可能的语言的表征功能都不应该仅仅作为语义学的研究对象而应作为哲学的主题,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为描述和解释世界的可能性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主体间有效的角度来解释某物的可能性条件,作为解释主体间有效表征的中介的语言功能原则上不能被客体化。我们可以证明它是以为符号为中介的知识可能性的先验条件,而不只是一种可能的研究对象。我们不需要追溯先于语言的本质和渊源,也不需要从语言之外的世界寻求根据,我们所要寻求的普遍性、规范性和客观性就来自于语言本身。阿佩尔不但拒绝从先于语言的意识或意向本身寻求知识的合理性依据的路径,而且摒弃了从语言之外的实在世界寻求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依据的途径,他完全从语言出发,从语言之中寻求传统哲学的终极基础,以语言代替传统第一哲学的主题,使之成为当代哲学的第三范式。

(2) 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先验性

在阿佩尔对先验语用学的论述中,语言交往共同体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他认为,一个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之维度。语言交往共同体的作用能够而且必须成为科学知识的一个主题。

阿佩尔认为,“在图像论的先验论和经典先验论尤其是

我自己的先验语用学概念的先验论之间的区别是如下事实：即在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中，没有预设能自我反思的先验主体，而代之以一种语言的先验逻辑形式对先验自我的关注。^[27]阿佩尔指出，无限的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先验语言游戏这一绝对具有规范约束力的理想的前提，被设定在任何论辩中了，也被设定在所有人类的词语中了。因此，交往共同体被证明是一个先验视界：当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相融合时，这意味着每一个人就他或她是人类社会的一员而言，总是已经融入了交往共同体之中，这个交往共同体是作为“机制的机制”，在这个作为机制的机制中，我们总是已经交织于规范性假设的网络之中。阿佩尔认为，逻辑实证主义和传统主体形而上学都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根据主客关系层面上的观察而来的知识总是已经把作为主体间层面上的意义沟通的知识设为前提了。“对符号学位置和交往性理解的认识论功能的真正先验反思在‘指号功能的实用维度’被认识之后仍是一个禁区。^[28]与此相反，阿佩尔认为，先验语用学必须始终假定：我们在一个只有词语和行为之内在关系的理想语言游戏的语境中，按其潜在的可理解性甚至真理性或规范伦理正确性来解释学地严肃对待人类行为和词语，这一要求来自于理想交往统一体这个先验前提，每个游戏本身总是已经维系于理想交往共同体中的理想语言游戏了。

如前所述，阿佩尔认为，如不考虑指号的语用学维度，那么语义学的指称就不能具体指涉时空中的真实对象而造成“语义学抽象谬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对世界进行说明的语义学的前提仅仅视为语言哲学研究的可能对象，而必须赋予其以先验功能。因为主体间的有效性必须通过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而加以证实。在此，“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是意义意向性的先验主体，它在一定程度上与皮尔士和罗伊斯的看法相同。^[29]阿佩尔由此得出结论说，指号学不仅要赋予指号功能的句法-语义学以先验性，也赋予语用学维度以先验功能，而指号解释的主体的先验性则是自我反思式知识的保障和条件。

三 结语：先验语用学——第一哲学的第三范式

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下，阿佩尔重提先验哲学的问题，力图通过改造康德的二元论的知识预设而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为西方哲学困境的脱出找到一条出路。他通过对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彰显而对康德的先验主体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以主体间性取代了方法论上的唯我论的地位，以语用学补充句法语义学而努力以语用学的转向来彻底地完成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赋予语用学以先验的性格，使之成为第一哲学第三范式。阿佩尔改造康德先验哲学建构先验语用学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实现了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指号化改造。

阿佩尔对康德的知识论进行改造，其结果就是建构了先验语用学。他从解释学的角度对康德的主体哲学进行批判，最终得到了既有经验特征又有先验性格的交往共同体这一概念。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先验范畴和原理是先天综合知识和经验认识可能性的先天条件，先验性在于强调感知和理

解力的先天构成方面，它旨在说明认知如何可能。康德先验论中试图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结合起来，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结合起来。但他的哲学也是一种主-客对立的哲学形态，这种先验的主-客关系为先验哲学和经验科学进行了划界。因此他面临着经验和先验之间的二元问题，即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之间的统一、物自体 and 现象界之间的统一问题。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既吸收了皮尔士从指号学角度改造康德先验哲学的路径，以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概念取代康德的先验意识概念，以终究可知的实在概念取代康德的不可知的物自体概念，同时又将解释学和科学主义结合在一起。以对指号学的三个维度的强调取代康德的知识论的二元论预设，从而使知识论从康德的主-客二元的泥淖中脱离出来。

其次，彻底完成语言学转向，建立第一哲学的第三范式。

当代西方哲学由以主客对立为主的思维模式转向以语言为中介的三元关系模式，语言学转向贯穿于解释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之中。而超越语言对事物本质进行反思的思想日渐衰落，哲学不再从“前语言”的范畴中寻求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解答了。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阿佩尔认识到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所揭示的语用的先验性，而通过对维特根斯坦后期生活形式概念的相对性倾向的认识而赋予先验语用学以先验奠基功能是阿佩尔哲学体系中的另一重要任务。海德格尔揭示了通过对世界的认知而形成的理解总是已经栖居于世界中此在的语境结构中了，这促使阿佩尔在哲学中通过语言来揭示世界的先验维度，因为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都强调了语言的先验性。阿佩尔认为，语言不再是一种中介或工具，而是有其自主性和本体性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语言中来寻求普遍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而不必从先于语言的意识或从语言之外的客观世界来寻求知识的可能性条件。他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保障知识可能性的先验条件，把语言交往的主体间性作为人类知识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以语言交往的无限共同体概念占领康德先验哲学中的先验意识的固有阵地，同时赋予语用学以先验性格。阿佩尔不仅抛弃了笛卡尔式的唯我论和胡塞尔式的先验论，而且他将先验的传统与分析的传统结合起来而不需追寻超越语言的哲学本源，以先验语用学的转向来实现西方哲学的范式转换的完成，并使之成为第一哲学第三范式。

最后，建立了沟通西方哲学两大传统的桥梁。

阿佩尔改造康德先验哲学的出发点之一在于建构联结大陆和英美哲学传统的“桥梁”。他揭示了解释学的自我理解的不充分性。他认为理解是主要借助于对文本作者的意向性的理解来解读文本的。但是这种方式有时也会有局限性，如对待精神病患者时，理解就必须结合行为的原因来进行。因此，理解需要解释来补充，而对行为的因果因素的揭示不是为了预测和实验控制，而是为了有助于个体、社会或传统进行自我反思，从而增进自我理解。因此阿佩尔在理解中使用解释的方法的目的是为了使解释学传统本身摆脱历

史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缺憾。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通过吸取语言学转向的可取之处而重新考察康德哲学时,尽量避免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问题及其障碍,先验语用学是力图沟通解释学和分析哲学的一种改造和“重构”。它一方面通过指号学使康德式的先验哲学与20世纪的哲学发展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通过赋予指号学以康德式的先验性而拓宽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视野,从而使先验语用学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形态。

总之,阿佩尔在其哲学工作中,力图将解释学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理论结合起来,以拓宽传统知识论的领域,恢复形而上学的权威。他的思想展现了目前我们仍然认为是对立的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交叉、对抗与共存。他进行了系统而体系化的重构,力图建构一个哲学体系,将语言而非意识作为知识的前提,并赋予其以先验性。他建构了联结解释学和分析哲学的“桥梁”——先验语用学或先验符号学,它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而被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参 考 文 献】

[1][2][3][4][13][14][15][16][17][18][20][21][23][24]
[29] Karl—Otto Apel. Selected Essays: Towards a Transcendental Semiotics[M]. Vol. I Humanities Press, New Jersey.

1994. 27、27、28 ~ 29、33、140、139、140、141、141 ~ 142、146、146、157、138、136、141.

[5]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202. 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23.

[6] [9] [27] [28] Karl—Otto Apel. From a Transcendental Semiotics Point of View[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38、10、12.

[7] [12] [22] [26] 卡尔奥托·阿佩尔. 哲学的改造[M]. 孙周兴, 陆兴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118、108、125、56.

[8] Karl—Otto Apel. Towards a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81 ~ 82.

[10] Searle, J. R.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Cambridge, 1969. 16.

[11] 盛晓明. 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0. 77.

[19] 李红. 先验符号学中的语用学转向[J]. 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0(5).

[25] Rudiger Bubner.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okman Book, Ltd. Taipei, 1992. 76.

(责任编辑 殷杰)